

老地方



上伯官城址出土的汉代铜印

◎ 汉代玄菟郡的设立及城址迁移

玄菟郡的设立及其变迁,是涉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区域地理的重要课题。从20世纪初迄今百余年间,国内外学界对此争议纷纭,仅就其几迁几治,就有不下十余种观点。

早年,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《满洲历史地理》及和田清的《玄菟郡考》,提出玄菟郡有三迁。其后在20世纪国内相关论著有傅斯年的《东北史纲》、金毓黻的《东北通史》、佟冬的《中国东北史》、张博泉的《东北历代疆域史》、薛宏的《中国东北通史》、王绵厚的《秦汉东北史》、宁梦辰的《东北地方史》,均涉论玄菟郡问题。进入21世纪,专门研究玄菟郡问题的专著,有赵红梅的《夫余与玄菟郡关系研究》。围绕玄菟郡的问题,最大的争议是玄菟郡的初治地点和变迁过程。

综合诸家所论,主要有“二迁三治说”和“三迁四治说”。王绵厚在1993年所著的《“玄菟”与“新城”新解》和1994年出版的《秦汉东北史》中,倾向于“三迁四治说”,对玄菟郡的历史变迁及其地理方位予以重点考察。简言之,王绵厚认为,历史上曾存在过“四个玄菟郡”。

从史料记载看,“第一玄菟郡”主要指汉武帝消灭卫满政权后,在今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玄菟、乐浪、真番、临屯四郡中的玄菟郡,其治所沃沮城应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东沃沮故地、今日本海西岸的北青古城(亦称青海古城),即后来渤海国的“南京南海府”,“第一玄菟郡”下辖高句丽、上殷台、西盖马等三县。

玄菟郡的第一迁址、即“第二玄菟郡”,在今辽宁新宾县清永陵南二道河子古城,对此,史学界内部意见基本一致。

但玄菟郡的第二迁址,即“第三玄菟郡”的准确位置,国内外史学界的争议颇多,至今难下定论,目前计有抚顺劳动公园、东洲、通化快大茂子(赤柏松)、沈阳上伯官屯等诸说。21世纪初,在经历辽东长城资源调查和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十余年潜心研究后,王绵厚判定,今辽宁抚顺东洲小甲邦汉城,应是“第三玄菟郡”的所在地。尽管在1985年时,此城仅存几百米残段,几乎被夷为平地,已成为一片果园,但地表仍可见汉代的绳纹陶片分布。1989年,该遗址内还出土了“千秋万岁”铭文瓦当,这是汉代在此设有郡守衙署的明证。因此,王绵厚推断,抚顺市东郊东洲小甲邦汉城,应为再次二迁的“第三玄菟郡”。

按冯永谦先生的“二迁三治说”,不断内迁的玄菟郡止步于今抚顺市劳动公园,目前改为抚顺宾馆,城址已被埋入地下。而按王绵厚先生的“三迁四治说”,玄菟郡的三迁、即“第四玄菟郡”不在抚顺,还要往西看,今沈阳浑河岸边的上伯官古城,才是玄菟郡的最终落脚点。



现今的上伯官屯

地处今沈阳新城区域内的汪家乡上伯官古城,在沈阳考古学家眼中非比寻常。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先生断言:此城,就是“第四玄菟郡”的治所所在地,是汉末魏晋时期辽东北部的行政、军事中心!与之相对的是,沈抚新城区内的一条公路也被命名为“玄菟路”,醒目的提示路牌,不断引发过往行人的“玄菟怀想”。众所周知,玄菟郡为汉代辽东名郡,几度内迁,治所先后移至新宾清永陵苏子河南岸及抚顺劳动公园一带,何时迁至今沈阳地界?这期间又隐伏了几多鲜为人知的世间秘闻?听罢考古学家的诠释,方令人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。

沈阳上伯官古城的“玄菟郡之谜”

◎ 上伯官古城或为『第四玄菟郡』

1993年,王绵厚在《“玄菟”与“新城”新解》一文中,指出今沈阳市东陵区汪家乡的上伯官古城为“第四玄菟郡”。对此,一些学者提出异议,既然玄菟郡的治所已内迁至今抚顺市东洲小甲邦汉城,为何又再西迁至上伯官呢?即便再迁,何不迁至已建城百余年、城郭完备的位于今沈阳市内的候城,或迁至虽史无记载,但可能比候城年代更早、更为重要的青桩子古城,为何非要另辟新城,在上伯官重起炉灶呢?王绵厚对此的解释是,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东汉安帝建光元年(公元121年),当时的高句丽王宫“遭嗣子遂成,……遣三千人攻玄菟、辽东、焚城郭”后,“第三玄菟郡”(抚顺东洲小甲邦汉城)被迫撤除,这才迁至今沈阳上伯官的,作为新玄菟郡(第四玄菟郡)的治所所在了。

高句丽人选择汉安帝当政时进攻玄菟郡,与这一时期的动荡形势不无关系。汉安帝刘祐(hù)是东汉第六位皇帝,在位19年,汉安帝即位时,东汉朝廷百事多艰。首先是河西急报,西域各国不满班超离任以后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的苛政,纷纷叛汉。接着就是羌族起义,汉羌战争长达11年之久,耗费巨大,使东汉元气大伤。边疆多事的同时,国内也灾害连年,人心浮动。在汉安帝登基的那一年,就有18个郡国发生了地震,41个郡国发生了水灾,28个郡国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。延光三年(公元124年),京城和23个郡国发生了地震,36个郡国发了大水、下了冰雹,百姓困苦不堪。

内忧外患四起之时,汉廷内为争夺帝位继承权又开始了殊死斗争,最终太子刘保被废,皇权和外戚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,以致皇权动摇。此外,汉安帝还重用宦官,朝堂上下纲常紊乱,政局黑暗。而高句丽攻击玄菟郡,就发生在这一汉廷不稳、无暇旁顾的敏感时段。

那么,上伯官屯古城是否具有玄菟郡的治所特征呢?20世纪80年代,王绵厚曾先后五次亲临此地,观其城址坐落在今沈阳城东20公里的上伯官屯的村庄内,傍临浑河支流牯牛河西岸台地。城址呈长方形,南北略长于东西,现存城墙的北侧和东侧大部分被河水冲去,仅存南侧城墙326米、西侧城墙537米,其规模大于汉魏时期的一般县城。早年调查时,城内尚存十字大街,其东西横向大街,即为明清时期的由盛京(今沈阳)通往抚顺关和兴京(新宾)的“御道”。后经沈阳考古工作者调查和测试,发现该城址地下文化层约1.5米处,出土了大量自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绳纹筒瓦、板瓦和青砖等。城址周围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,也与城址内出土的文物相同。这些文物,与该城址地处浑河(小辽水)上汉魏晋唐时期的“玄菟——新城道”方位,及城北浑河沿岸的多处墩台,共同证明了上伯官屯城址的时代和性质。

另外,该城址与汉魏至两晋时代辽东玄菟郡通向苏子河“南狭之险”的得胜堡山城的方位,也完全吻合。综上所述,王绵厚认定,位于今沈抚新城区域内的上伯官屯古城,当为汉代“第四玄菟郡”无疑。

◎ 上伯官古城乃『玄菟古道』的兴经地

在考辨了玄菟郡的历代变迁后,与此关联的玄菟郡与辽东“南北二道(南道与北道)”的关系问题,就自然摆到桌面上来。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,上伯官古城都是这条或可称为“玄菟古道”的必经之地。

就其“南道”而言,从今沈阳东20公里浑河南的上伯官屯(王绵厚考证的“第四玄菟郡”)、青桩子古城(辽东郡东部都尉)东行,约25公里到达抚顺高尔山山城(新城),再东约10公里至东洲小甲邦汉城(第三玄菟郡),继续东行过新宾南杂木,进入苏子河古道,先抵木奇镇和五龙山城(木底城),由五龙沟进入古称“南狭”之道。由此东10余公里有下房子古城(1985年调查时有遗物),由下房子东行10公里至新宾永陵。在永陵东南1公里,即至二道河子古城(第二玄菟郡),至此到达“南道”的起点。

就其“北道”而言,同样是从今沈阳东的上伯官屯(第四玄菟郡),至抚顺永陵二道河子古城(第二玄菟郡)的前一段,由二道河子古城发轫,沿苏子河南岸东行约20公里,先达今新宾县城,在县城以东的苏子河上游的白旗堡汉城(幛沟娄城)东经红升乡,进入富尔江流域,再东行约20公里,至吉林通化西南赤柏松的快大茂子古城(上殷台县)。“北道”至快大茂子古城后,折而沿富尔江南行,抵达富尔江与浑江汇合处的集安西北之“江口村”,这是“北道”的重要河险关口。过望坡岭关隘后,“北道”由新开河进入麻线河上游,过老岭沿麻线河上游东行到小板岔岭。1906年,在小板岔岭西北的天沟山坡,发现了著名的曹魏“毋丘俭丸都山纪功碑”残石(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),这是当年曹魏大军征讨丸都城所经板岔岭的千古石证。过小板岔岭沿麻线河东行2公里到石庙子,再东南行约1公里则到二道阳岔,由二道阳岔东行,翻过山岭即到达丸都城(今吉林集安)。

由上述记述可知,无论走“南道”还是“北道”,进出辽东地区,上伯官古城——王绵厚考证的“第四玄菟郡”及其控制的临近区域,都是绕不过去的途径之地,商贾通行、兵家必争,其所在位置的重要性,实在是不言而喻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张松 文并摄



沈阳四环路上的上伯官路牌



上伯官城址省级文保碑